



山西抗战纪事

一卷

杨茂林 主编



1892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山西抗战纪事

一卷

杨茂林 主编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序

研究和撰写《山西抗战纪事》，始于接手《山西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的地位》这一重大研究课题。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各种相关历史资料，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即山西是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前沿和全民抗战的热土，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尽快把这段历史挖掘好、研究好、撰写好，将历史真实地传达给社会和世人，让大家毋忘国耻，维护和平。的确，山西人民所遭受的空前苦难，山西大地所遭到的百般蹂躏，让我们悲伤流泪，仇恨在心；而山西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和流血牺牲，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的辉煌胜利和历史功勋，则让我们由衷钦佩，感动不已。这样的材料很多，事例也不胜枚举。

山西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日本人加藤真一写过一篇《山西纪行》，讲述了1925年考察山西时的遭遇，当时刚刚发生上海反日工人大罢工、共产党人顾正红被日本纱厂工头枪杀的事件。他们的考察路线大致是：先到偏关，继而沿黄河往河曲、保德、碛口、柳林、离石、汾阳、文水、清源和太原走，然后离开山西，但没想到竟遇到了强烈的反日活动。在柳林镇，爱国学生鼓动商店、旅店的店主，不卖给日本人东西，不让日本人住店，并贴上“不许日本人住店”“与英日断绝经济交往”“不许与日本人交谈”“日本人从中国大陆滚出去”等标语，组织游行和发表演说，驱赶日本人；在离石县，学生组织起来，鼓动店家不留宿日本人，不租用骡马给他们；在汾阳城，马店店主拒绝给日本人租用马车；在清源县，店家不给日本人提供住宿，学生组织游行和发表演讲，迫使他们连夜赶路；在太原城，马店都不让日本人住，这些人被警察和宪兵以学生反日为由，

劝离了太原城。这说明，山西人当时的思想是开放的，与全国的联系是畅通的，山西人民是富有民族感和正义感的。

山西人民在日军侵略中遭受了历史上的空前苦难。任弼时在1938年1月撰写了《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近距离地揭露了日军侵入山西的暴行：“日寇在疯狂的侵略政策下，采用一切征服殖民地最野蛮凶恶残暴的行为来对待我被占区域的同胞。每到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崞县县城被杀者二千余人）。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两岁的小孩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毁。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奸死者不知其数，未死者亦多遭杀戮。且大批强征青年妇女以汽车运去（仅朔县维持会，就为日寇强征3000青年妇女）。最残酷者，莫过于最近高邑县（今河北省高邑县——引者）之惨案。其经过是：12月19日，日寇到东塔镇强奸妇女，激起当地群众愤怒，群起抵抗。20日，开来日军，将该村群众一百余人均以铁钩悬于树上，割开肚子，提出肠胃，复将人头击破，灌以洋油，燃火焚之，然后将房屋焚毁而去。”这才是山西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始。

山西人民始终坚持着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陆定一在《寄自晋东南》中说：“有几位冒险的记者，听说晋东南是敌人后方，被敌人占领去了，糟蹋得‘不亦乐乎’，只剩少数的我国军队躲在山上。他们冒了大险，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到晋东南看看究竟。他们来了。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脚踏到晋东南的土地上，才知道不但山上是我们的，而且平地也是我们的，才知道这里并不如外面所传说的那样凄惨景象，人们并不是垂头丧气的，恰恰相反，在城市的街道上，你看见人们熙攘往来，常常有大的集合和游行在进行着，人们脸上泛着胜利的微笑，谈起日本鬼子来就说得出一串悲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故事，而这种悲惨的故事谈到后来就变成悲壮激烈的仇恨的誓言。”当时，在阳城，就连放羊的孩子也在唱“向前走，别退后”，引起了他人接唱，“人民被屠杀，土地被强

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在长治，朱德总司令召开士绅座谈会，给大家分析国际局势，谈国共合作，释合理负担，讲共产造产，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沁县，《新华日报》的铅印机在深山里转动着，日报在华北一销就到了两万份，每天都在传递着斗志，激励着精神。1939年3月，曾经在盂县上下鹤山歼灭战中被俘的日本兵说：“我来中国后曾打过三次仗，从未见过正式的中国军队。这次战斗，是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

山西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略要地。毛泽东于1938年曾对美国合众社记者说过，八路军正在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就无法灭亡中国。事实证明就是这样。战后日本防卫厅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道，日军占领太原后，“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张闻天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党在山西的方针，是让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当时，共产党就是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的例子，证明给全国人民看：不论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样厉害，不论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消耗他，疲惫他，瓦解他，打击他，最后完全驱逐他。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任弼时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山西自雁门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对保卫华北、支持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进攻感到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山西是中国抗战军民打击入侵敌寇的敌后主战场。朱德总司令

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中指出：“八路军入晋后，开始平型关的巨大胜利，给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杀不少。”当时，全国上下，贺捷电报飞向八路军，其中上海各界救国会在贺电中说：“贵军受命抗敌，力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在晋察冀抗日军民粉碎日军“八路围攻”后，国际友人安特尔写道：“在这些游击队接连不断的扰乱和袭击下，日本军一时就不敢向南推进，把很多数量的军队都停留下来，企图用以消灭那些游击队。但是，这根本没有影响到那些游击队的发展，他们反而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的边界上建立起了和日本军长期作战的根据地”；“的确，这根据地中的中国人民已经有非常坚强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经常地打击日本军。这种力量，当他们刚刚开始形成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顽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现在是日益强大”。当晋东南抗日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山西胜利的意义》的短评：“山西的胜利，证明了敌人最后失败的必不可免。这几个月来的战事，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弱点；敌人想以现有兵力平均分布各占领区域，则兵力单薄，处处受我打击；反之，兵力集中一处，固然可以猖獗一时，但其他地方兵力更加单薄，盘踞更不易。这一顾此失彼的弱点，是敌人无法克服的”；“山西胜利是怎样获得的？是由于我军民的团结，将士的忠勇，游击战斗技术的优良”；“在这捷电频传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期望着山西的将士们更英勇更坚强，将日寇逐出雁门关，逐出太行山。光复山西，成为我们收复河北及东北的根据地，我们遥祝山西将士们的胜利”。因此，可以说，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战略展开，逐步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扭转华北战局乃至影响全国抗战的奇迹。

山西是当时全国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纷纷前往的地方。1937年9

月，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远拜访了在太原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与此同时，伟大的爱国人士李公朴也在太原拜访了周恩来，并于1939年10月，带领“抗战教学团”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不仅开展抗战教育，而且亲自调查和参加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完成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等著作，客观描述了根据地的真实状况，由衷地赞叹道：“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1938年年底，卞之琳在太行山根据地进行随军访问后，发表了《晋东南麦色青青》，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在长治城，街道上走来了许多穿灰色和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这里的街上拉了手，带来了意外的欢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军衣。原先不认识的也总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在这里我遇见了杭州梁氏三姐弟。他们中姐姐在决死三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正预备当县长；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炼过，现在是一个记者；弟弟从抗日延安军政大学里出来了，正要到河北去打游击。”

山西抗战当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早在1937年10月，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杰姆斯·贝特兰在见过周恩来后就断言：“这是显然的，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第八路军的身上。”1938年6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不仅救治伤员，而且建立模范病室、创建特种外科医院，提高了治疗效率，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对自己与八路军相处的这1年零8个月时间，他很感慨：“我万分幸运能够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向你们表示：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6位外国记者，于1944年8月中旬来到晋绥军区参观；9月初，又前往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访问，参观了分区医院及兵工厂，见到了被俘虏的日伪军；9月中旬，又来到汾阳县，见证了八路军攻击汾阳日军据点的战斗，看到了被攻克の日

伪据点、被押解的大批俘虏和被缴获的大量战利品，非常感慨：“我们看到了你们英勇作战，看到了你们的胜利和牺牲，看到了人民是怎样的拥戴你们，看到了解放区军民是怎样的同仇敌忾！”参观团中的福尔曼先生说，我要将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的武器援助，最后打垮日本法西斯。武道先生明确指出，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而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爱泼斯坦则表示，这次我们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和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人类和平而斗争。参观团记者们于10月初离开山西，他们把晋绥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及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建设情况，向全世界做了客观而生动的报道。

尽管战争残酷，生活艰难，但这里始终洋溢着胜利的激情，就像冬日里已经出芽的麦苗。当时，卞之琳坚定地相信，初到太行山时“我们在一片苍黄的冬野里看见那青青的一行行，就仿佛在一个否极的旧世界里看到了希望本身”，“现在还是冬天，更大的冰雪多分还要来，可是麦苗一定会愈锻炼愈有劲，不但如此，它们一定还会就从冰雪的本身吸取使它们滋长所必需的水分”。是啊，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以当时的见闻和评论为序，恐不多见，虽不一定全面，但有历史的客观与真实，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和想传承的。无论如何，把在山西发生的这段难忘的历史挖掘好、研究透、撰写全，以告慰在战争中死去人们的在天之灵，彰显在战争中为民族和人民牺牲的烈士们的千秋功业，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初衷和动力。

杨茂林

2015年7月15日于太原

编辑说明

山西抗战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画卷。怎样才能挖掘好其内容、反映好其面貌呢？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内容和编撰体例，还是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应该能阐释清楚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进程，突出其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

1. 我们采取了以纪事为主的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即以一事为起迄，详一事之始末，每一事为一题，各排次第，详叙始终。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每一事每一题，按照其不同内容，分成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艺、文学、教育、生态八篇，按时间先后集中叙述，清晰连贯地反映某个方面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为弥补以事为题、事事之间缺乏联系的不足，我们在每篇前有一概述，以加强总体描述和说明，更好地反映本篇所涉及人事的历史线索及其之间的逻辑联系。

2. 我们力求把握好以下关系。(1)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既注重宏观而巨，有对大事件、大发展、大变革所做出的宏观叙述，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在山西进行正规战役以及第二战区进行抗战活动等；又关注具体而微，如对基层抗战活动的个案研究和细致描述，普遍涉及社会下层、妇女、家庭、社会团体、劳工阶级等在抗战中的心理和行为、思想和行动等。(2)“自上而下看这段历史”与“自下而上看这段历史”两种视角。既有上层精英阶层引领或领导的重大事件，也有下层或底层社会群众参与各种抗日活动的历史事实。(3)综合研究与重点研究。既有总体情况，也有政治和军事情况，更有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文学、生态等情况；既有山西各阶层、各党派等全民抗战情况，也有国民政府和阎锡山地方政府等抗战情

况，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情况。(4)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既充分利用史料等文献，又广泛吸纳包括口述资料在内的各种最新研究成果；既有传统的综合研究和定性分析，又特别重视应用数量统计做出的量化分析。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力求避免对已知事实做简单陈列，而是在理清何时何地何事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系统归纳，做整体评析。

3. 研究和撰写遵循的要求。第一，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而准确地研究和撰写山西抗战历史，做到史实清楚、立论有据，并能提供新知识和新范式。第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广泛收集史料，吸纳最新成果，“采群书而为书”，“合众家之长为一炉”，在史实记载、分析评论、文字表述等方面做到最好。第三，吃透历史材料，围绕专题和分篇的架构，组织和安排好相关材料。第四，尽可能地做到史论结合，以叙事为主，并加以评论点睛。第五，以讲故事的叙事特点和风格，增强研究成果的可读性和社会效益。

总之，本书的撰写，力求客观展现山西抗战历史，达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效果，同时既成有可读性的历史读本，又成可供借鉴的学术著作。

绪论：山西抗战历史透视

众所周知，山西是抗战时期中国山地游击战争的主战场，也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据初步统计，山西现存抗战遗址多达 3000 余处，重要的就有 562 处，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这些抗战遗址，连同存量极其丰富的战争史料和流传极为广泛的战时故事，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见证，也是山西抗战重要地位的历史观照。山西抗战历史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也承载着山西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更揭示出山西军民面临民族危机时所爆发出的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高昂斗志以及不畏牺牲、勇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本书围绕山西抗战历史，按主题分类进行透视，分别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艺、文学、教育、生态八个方面进行纪实性描述，目的在于全面挖掘和系统反映山西抗战这部伟大而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

一

政治篇，以建立和发展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为主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民族大义，为促蒋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及至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国爆发，终使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1937 年 8 月 25 日，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开始以山西为中心指导华北抗战工作，实现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工作的重点转移，成立了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晋绥察各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参加的“第二战区民族

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促进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基本结束,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署,八路军于1937年11月分兵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的战略展开。1938年武汉陷落后,战斗在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三师主力,首先奉命向东开进,分别深入冀南、冀中、山东和冀鲁豫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分阶段全面建设民主政治。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转折点。1941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各抗日根据地节约了开支,减轻了负担,使军队做到机关精干、连队充实、训练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为抗日根据地度过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42年春天起,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整风运动,山西抗日根据地通过党的建设,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了党政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充分准备。

1939年,在山西逐渐形成了日军占领区、第二战区控制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政权交错并存的格局。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其大本营回攻华北作战的指导方略,正式提出“治安肃正”作战目标,即按照“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方针,以分割、封锁、讨伐相结合,“分散配置,分区‘扫荡’,灵活进剿”,轮番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拿下华北。进入1940年,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更趋频繁,残酷推行“囚笼政策”,但都遭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有力反击,被彻底粉碎了。日军鉴于山西在华北战略地位的重要

性，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经过多次协商，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指派赵承绶到汾阳城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楠山秀吉等正式谈判，签订了《汾阳协定》。后来，由于阎锡山不敢贸然投降，日军最终废弃该协定，开始加紧了对晋绥军和阎占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

二

军事篇，以山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山西正面战场战役为主线。

在全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山西承担起了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使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战略防御阶段上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主要是战略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征山西对日作战，拉开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随着敌后抗战的深入发展，山西敌后战场钳制了众多日军兵力，消灭了大量日伪军，逐渐成为华北抗战的主阵地、主战场。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的第一阵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把山西视为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把侵略战火烧到晋北，力图造成纵深进击太原的战略态势。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三个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和太行山区，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先期抵达晋东北的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之后，八路军又连续出击敌人，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战役，成为国共两军协同配合、共赴国难的光辉典范。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巩固、发展、壮大敌后战场的战略依托。太原失守后，抗战进入了抗日游击战争从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新阶段。中共北方局在《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运用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要将“小游小击”“中游中击”“大游大击”结合起来，以调动大敌于运动战中歼灭之。按照这一方针，八路军相继创造了神头岭伏击战、午城战役、薛公岭伏击战、榆辽战役、田家会大捷等一系列典型战例，粉碎了日军“五路围攻”晋西北、“八路围攻”晋察冀、“九路围攻”晋东南等一系列军事进攻，将日军占领的“点”的四周和“线”的两侧的广大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再次拖住了急欲吞噬山西全省而强渡黄河的日伪军。在对敌斗争中，八路军部队迅速发展，由出征时的4万余人增至近16万人，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支撑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重要基地。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将交通破袭战推向了敌斗争的巅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西抗日军民以人民战争的铁拳，粉碎了日寇的“扫荡”与“蚕食”，打退了反共顽固派的“摩擦”与进攻，渡过了险关，保存了力量，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支持华北长期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同时，山西抗日军民也创造了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联防战、围困战等各种各样的对敌斗争形式，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拥军模范。当战略反攻开始后，以山西为中心的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又以“最前面的战略基地”，最先拉开了“中国抗战的三幕戏”中“最精彩的落幕”，向日伪军发起了迅猛进攻，为夺取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山西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进行了一系列正规战役，这一阶段的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为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多次在侧翼有

力配合了友军，这些战役中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就是太原会战，包括天镇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参战的中国军队约28万人，伤亡约10万人，日军投入14万人的兵力，伤亡约3万人，这些战役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方针，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1年5月，日军以10万余人的兵力进犯中条山，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战斗持续月余，战况惨烈悲壮，虽然打击了日军，但由于轻敌、缺乏精心准备，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始终不放弃反共策略，这次战役最终以国民党军队伤亡巨大而失败了。

山西正面战场，尤其在战略防御阶段，是多支部队合作抗日的主阵地，既有晋绥军，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滇军，还有八路军，他们所进行的战斗、战役都是山西正面战场的组成部分。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但中国将士奋起抗击，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抵御侵略者的爱国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丰碑上。

三

社会篇，以山西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奋起斗争为主线。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是中国社会遭受多种苦难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践踏，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山西就是这种苦难和危亡的真实缩影，在这里，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焚毁家园，杀戮百姓，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民众生活极度艰难和困苦。为躲避日本人的残暴，山西的老百姓颠沛流离，有的甚至长年躲进深山，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即便在日军走后回到家里，也吃不饱、穿不暖，生计特别困难，生活尤其艰辛。特别是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使老百姓惶恐不安，精神郁闷，所造成的恐惧和留下的伤痛经年不能祛除。更为恶毒的是，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实施毒气战和细菌战，污染了山西许多地方

的水源，造成病菌肆虐，许多人得了疥疮、染了伤寒、患了痢疾等，而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落后，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医治，使许多民众遭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苦不堪言。

这一时期，山西人民虽历经苦难，但没有失去乐观态度和斗争精神，他们坚强耐韧，在战争中顽强地生活着，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们抱着生存念头，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由平原向偏远山区逃难，或务农或经商或务工，努力寻找着活下去的办法和支点。同时，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及自己同胞们的鲜血，也刺激和唤醒了民众心中的反抗意识，在面对侵入家园的日军时，他们也不顾安危地进行反抗，英勇地投身于抗战杀敌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其他各种抗日武装，英勇抗战，戮力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动员集聚了山西各阶层的民众奋起抗日，而且吸引着全国的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来山西参加抗日活动，他们最终成了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有生力量。

这一时期，山西境内的各种宗教作为当时影响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不少组织和许多信众，因此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给苦难中的民众带来了心理慰藉。日本侵入山西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曾使了不少手段，企图利用这些宗教进行文化奴役。国难当头，山西宗教界人士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利用自身的独特条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主动支持八路军以及抗日干部群众的抗日活动，有的甚至直接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成为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支社会力量。

这一时期，山西妇女遭到了残暴对待和非人折磨。日军从1937年入侵山西，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无论是在占领的城市还是乡村，以及“扫荡”过的地区，都烧杀奸淫，从未停止过对山西妇女凌辱施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山西妇女没有屈服，她们奋起抗争，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捍卫自由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当时在山西，许多妇女自发抗敌，妇女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晋察冀边

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就是抗日根据地中最早成立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种妇救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发挥了极为特殊的重要作用。

四

经济篇，以山西经济、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主线。

抗战时期，由于山西敌后根据地初建，条件自然非常艰苦，加之日军对游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所以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就提出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建立公营企业，逐步实现由依赖外援为主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当时，各敌后根据地首先提出要繁荣农村经济、发展人民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实施了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为推动农业发展，各根据地采取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改善了穷苦农民的生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经济战线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敌后根据地积极推行大力垦荒、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等措施，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稳定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还根据实际发展经济，由政府、部队等创设公营经济，同时鼓励发展合作经营、私人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家庭副业等，使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从而在国民党政府断绝拨给任何款项、物资和经费的情况下，依靠各项正确政策和抗日军民的积极性，保障了经济支出需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山西只有晋西南的23个县由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治理，其中15个与敌占区或根据地犬牙交错。1942年下半年，第二战区经济困难，需要解决120余万军民的生计问题。阎锡山提出要学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007